

中图分类号:D52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621(2013)05-0032-011

特邀主持人张西平语:

梅谦立教授近年来一直在从事儒家文献西译与传播的研究,这次推荐给大家的也是他的最新研究成果,很值得一读。特别是文后所提供的《孔子传》的翻译,是一篇珍贵的文献,对推进孔子在西方的传播研究十分有价值。以往学界关于中西文化交流史的研究大都侧重“西学东渐”,对“中学西传”研究不够。本栏目从建立起就开始纠正这种倾向,力争还原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历史的全貌,我们欢迎国内学术界朋友踊跃投稿。这里特别强调一点,本栏目也欢迎重要文献的翻译论文,“中学西传”研究的基础是文献的整理和翻译,这方面仍有大量的基础工作要做;同时,对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的综述性研究论文,本栏目也愿意采纳。

东方的“哲学之父” ——论最早的西文孔子传记的撰写过程

□梅谦立

(中山大学哲学系,广东 广州 510275)

摘要:目前流传下来最早的西文《孔子传记》有1662、1669、1687年三个版本。三个版本有同有异,一个明显特征就是,它们越来越准确地呈现出中国传统中有关孔子的信息,从中也反映出耶稣会士对孔子在西方社会传播所起到的作用。

关键词:孔子;哲学家;《孔子传记》;殷铎泽

第一批来华的耶稣会传教士很快就发现孔子在中国社会与文化中的重要地位。意大利耶稣会士罗明坚(1543-1607)及利玛窦(1552-1610)在他们的书信中有关于孔子的简略描述。虽然利玛窦在韶州开始翻译“四书”,但是此时他还没有写出孔子的传记。当耶稣会士撰写了《大学》、《中庸》拉丁文中文双语译本来培养新来的传教士时,才把《孔子传》附上^①。这里,我要介绍保留下来的最初的西文《孔子传记》,即1662、1669、1687年的三个版本,并分析它们的异同,然后附上郝晓霞女士在我的指导下所翻译的1687年的版本。

一、1662年的孔子:非偶像崇拜者及有信仰的哲学家

1659年,刚来华的年轻意大利耶稣会士殷铎

泽(Prospero Intorcetta, 1626-1696)被送到江西建昌(今江西南城县辖镇),在葡萄牙耶稣会士郭纳爵神父(Inácio Da Costa, 1599-1666)那里学习中文。郭纳爵向殷铎泽讲解了“四书”。经过两年多时间,他们于1662年在建昌刻印了《大学》的中拉双语译本,标题为拉丁文 Sapiencia Sinica^②。因为这本书主要是培养耶稣会士的语言教材,所以没有中文标题,今天可以命名为《中国智慧》。读这本书的“致读者”(Ad lectorem),我们可以知道还有三位来华不久的耶稣会士跟郭纳爵学习中文,也多少参与了翻译工作,他们是奥地利耶稣会士恩理格(Christian Herdrich, 1624-1684),两位弗拉芒耶稣会士鲁日满(François de Rougemont, 1624-1676)及柏应理(Philippe Couplet, 1623-1693)。这样看来,在1659-1661年这两年内,郭纳爵

收稿日期:2013-07-20

作者简介:梅谦立(19),男,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

①关于来华耶稣会的中文培训方案,参见:LIAM MATTHEW BROCKEY. Journey to the East: The Jesuit Mission to China, 1579-1724[M]. Cambridge: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7:243-286.

②这本书今天收藏于罗马耶稣会档案馆(Japonica-Sinica III 3)。关于基本介绍也参见 ALBERT CHAN, S.J. Chinese Books and Documents in the Jesuit Archives in Rome Armonk[M]. NY: M.E. Sharpe, 2002:474-477.

就已经把这四位年轻耶稣会士组织起来,让他们在学习中文的过程中翻译“四书”。不过,这个翻译团队并没有维持多久,因为他们在学一两年后就被派到全国各地去传教,只有殷铎泽一个人继续这项翻译工作。

《大学》与孔子的教导有密切关系,因此《中国智慧》也包括很简短的《中国智慧之父孔子的传记》(Vita Confucii, Principis Sapientiae Sinicae)。这种标题很明显地表达了对孔子及其思想的地位与意义的认同,或如殷铎泽在其中的“致那些在远东照顾耶稣葡萄园的可敬神父们”里^①所说:“中国智慧符合自然法及基督宗教。”在这部孔子传记中,孔子经常被称为哲学家(philosophus)。耶稣会士按照他们的思想框架确立了孔子的形象:他不是宗教领袖,而是哲学家。

传教士很可能采用了明朝的材料来写孔子传记。现在很难知道他们到底用了什么版本,不过,几乎所有信息都来源于《论语》、《孔子世家》及《孔子家语》。在四页的篇幅中,传教士首先提及孔子的家庭背景及出生情况,然后提到了孔子的仕途。在这方面,他们主要陈述了五个故事。第一个故事是齐国送八十美女诱惑孔子。传教士挑选这个故事来表现孔子能克制欲望并能完全投入到自己的使命中。第二个是桓魋要杀孔子的阴谋,表现了孔子对天的信赖。这两个故事在《孔子世家》里面都有提到。第三个故事是直接从《论语》中抽取的,即孔子见南子。跟桓魋的故事一样,这个故事表示,如果孔子有错,他愿意承担天的惩罚。第四个故事是王孙贾问孔子关于祭拜奥神的事情(《论语·八佾》),但孔子驳斥王孙贾。这当然受到传教士的赞同,由此他们认为孔子反对偶像崇拜。第五个故事提到,孔子生病时,弟子们要为他祭拜上下神祇,但孔子拒绝了(《论语·述而》)。这里,传教士提出了注释家的说法:因为孔子一直在反省自己的缺点,所以他不需要祈祷,也不需要去祭拜神祇。文中也提出了张阁老(Cham Colao)在《论语评论》中的几处说法:“孔子一辈子都相信对于神灵和人们而言存在某种最高主宰。”^②“张阁老”指的无疑就是晚明内阁首辅张居正(1525-1582),这里的《论语评论》是指他

的《论语直解》。这也说明,起码从1659年起,耶稣会士就开始使用张居正的评论,并将它们作为自己翻译四书的主要依据^③。这第三、第四和第五个故事在后来的1669及1687年版本里都被删掉了。

谈到孔子的门徒时,《论语》中提到孔子门下十位最出色的学生,他们的名字被逐一列出。关于孔子的教导,传教士跟随宋明理学关于“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的诠释去理解,强调要恢复本性。另外,他们以“敬天,爱人,克己”概括了孔子的教导。

后面部分很明显脱离了中国传统的孔子传记。在里面,传教士也试图证明儒家与天主教不矛盾,天主教甚至可以补充儒家。这可以找到根据:如同《列子·仲尼篇》所说,孔子自己很谦卑,认识到自己有缺点,并且在等待“西方有圣人”。虽然孔子不知道这个圣人是谁,但对传教士而言,孔子所等待的圣人就是耶稣。第二个历史根据是汉明帝梦见“圣人”——在《后汉书》中确实可以找到这个故事,但这并不涉及耶稣基督,而是涉及释迦牟尼佛。于是,传教士描述佛教如何给中国带来偶像崇拜的灾难,而孔子自己是反对偶像崇拜的。在此,文中出现了我前面所提的第四和第五个故事。

之后的传记又回到孔子本身,描述他怎么逝世,怎么被埋葬等。它所提供的信息都可以在《孔子世家》中找到。孔子去世时比较悲伤,因为他自己说,他的努力最终失败了。不过,如同前面提到的,对传教士来讲,孔子的悲伤证明了他的谦卑及无力,暗示孔子在渴望另一个圣人的来临。接下来有一系列关于孔子身材的描述,内容都出自《孔子世家》。

最终,文本再提出了孔子在中国社会文化方面的影响:教育制度、孔庙等等,把他称为“万世师表”及“至圣先师”。虽然秦始皇下令破坏孔子的著作,但直到清朝的所有朝代都尊敬孔子。

这个西文第一部孔子传记已经提供了关于孔子的重要信息。它主要试图确立孔子的身份:孔子不朝拜偶像,并且相信天的存在,但他主要是使用自然理性。可以说,他是有信仰的哲学家。

^①Sapientia Sinica, “RR. Patribus Extremi Orientis in Domini vinea Cultoribus”。“耶稣的葡萄园”比喻为耶稣托给他的门徒的传教区。

^②Confucius per omnem vitam censuit esse aliquem Supremum, Coelum nempe, Spirituum hominumque Dominum。

^③关于耶稣会士使用张居正《四书直解》的原因,参见 Thierry Meynard, Confucius Sinarum Philosophus (1687): The first translation of the Confucian Classics (Roma: Institutum Historicum Societatis Iesu, 2011), pp.61-68。

二、1669年的孔子：非无神论者

由于杨光先在北京发动的“历案”，当时全国的外国传教士都被集体流放，1666年3月有二十三位传教士到达广州并在那里被软禁了将近5年时间，也就是直到1671年1月。当殷铎泽到达广州时，他很快就把《中庸》翻译完，并有十二位耶稣会士检查了他的译文。名单上的第一位是殷铎泽的老师郭纳爵，不过63岁的他在1666年5月去世。在名单中还有殷铎泽的三个同学恩理格、鲁日满及柏应理的名字。1667年7月31日，也是圣依纳爵大节日，殷铎泽的《中庸》译文得到了耶稣会中华副省的省长成际理(Felicianus Pacheco, 1622-1687)的许可^①。这本书没有中文名字，只有拉丁文名字 Sinarum Scientia Politico-moralis scientia，今天可以翻译为《中国政治道德的学问》。我们要注意：这本书的前半部分是在1667年底刻印，由于当时受到软禁的殷铎泽突然奉命被派往欧洲，他匆忙偷渡离开广州去澳门上船，所以这本书的后半部分，包括我们所讲的孔子传记，如同书最后一页所说^②，是于1669年10月1日在印度果阿刻印的。还有一点需要注意：所有在广州的传教士从1667年12月18日至1668年1月26日开会，讨论天主教仪式，并且在会议的最后一天激烈地讨论祭孔仪式，最终决定允许它们^③。会议之后，殷铎泽在1662年版本的基础上补充了孔子传记，因此，下面可以看出，殷铎泽关于孔子传记所作的改动明显反映了在广州时传教士之间的争论。

《中国政治道德的学问》中的《孔子传记》主要抄自《中国智慧》，不过，它有三个突出的特征以及两处补充。第一个特征是更高的正确性。关于孔子的家庭背景及诞生，殷铎泽进一步补充了相关的信息：譬如他诞生的村名(陬邑)、他母亲的名字(征在)、孔子出生时他的父亲已70岁；

关于孔子死亡的时间也有更详细的说明。另外，新版本也修改了一些错误的拼音：原来兖州被拼读为 chum cheu，而现在修正为 yan cheu。关于中国历史的日期也算得更准确：本来只说孔子在耶稣五百多年前诞生，而现在说耶稣前551年，这也是我们现在所使用的年份。传说孔子共有弟子三千，其中孔子认为“受业身通者七十有七人”(据《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又一说：贤人七十二。关于孔子弟子的数量，《中国智慧》提到的有3072、500、72及10这几个数字，而《中国政治道德的学问》修改为3000、500、72、10。其中的500那个数字不清楚具体指什么。尽管如此，《中国政治道德的学问》还保留着一些错误，比如伯鱼，两个版本都加上了汉字，但是写错了(伯渔)。

第二个特征就是孔子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更突出。首先，孔子的出身被神化。《中国智慧》只说孔子的父亲担任大司马，但《中国政治道德的学问》把孔子看作中国先王的后代，把他的祖先溯至帝乙。司马迁并未记载孔子的贵族血统，殷铎泽在此引用了《孔子家语·本姓解》这一不可靠的记述。后来，柏应理在《致路易十四的书信》中表示自己赞同殷铎泽的看法，即认为孔子来自王室血统。另外，孔子的后裔也被神化。《中国智慧》简单说明了伯鱼的死亡，《中国政治道德的学问》除此之外还表示，孔子的家世没有因伯鱼的去世而中止，中国人至今仍然尊敬孔子的后裔。关于中国人对孔子后裔的尊敬，殷铎泽也许没有完全根据一般的孔子传来写，而是自己加上去的，因为1666-1667年传教士之间关于“祭孔”出现了争论，所以殷铎泽当然要强调孔子的重要地位，他甚至描述了汤若望怎么在北京亲自见了孔子的后裔，还说按照汤若望的观点，孔子源于成汤、禹、皇帝。其实，这个说法不太明确，因商朝的成汤晚于传说中的大禹，并且“皇帝”的意思不清

^①名单与出版许可放在书的开头。这本书今天也收藏于罗马耶稣会档案馆(Japonica-Sinica III 3b)。关于该书的基本介绍，参见 ALBERT CHAN S.J. Chinese Books and Documents in the Jesuit Archives in Rome[M]. Armonk, NY: M.E. Sharpe, 2002, pp. 477-479。不过，这本书不全，缺少最后八页的孔子传记。我这里所使用的完整版本藏于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北京国家图书馆缩微处有缩卷(Lust 目录第732号，伦敦，1987年)。感谢北京外国语大学海外汉学研究中心罗莹研究员提供给我的材料。

^②广州会议的41条：“对于中国纪念其先师孔子和祖宗的仪式，1656年，教宗裁判所经过亚历山大七世教宗陛下的同意作出了答复。这些答复应该被完全执行，因为它们是建立在良好可能性的基础上。显然，对此不能有反对意见。由于这个可能性，我们不应该对无数中国人关上拯救的大门。如果禁止他们举行这些仪式，就会阻止他们加入基督教。这些仪式是合法的、真诚的，是可以进行的。它们如果被迫放弃，将会有最严重的损害。”苏尔·诺尔. 中国礼仪之争——西文文献一百篇[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5-6。此处我稍微修改了译文。

楚。殷铎泽在另一处提出, 顺治皇帝很隆重地接待了孔子的后裔。如此, 殷铎泽表示他非常佩服孔子的地位在中国历史上能有如此漫长的连续性。确实, 在西方历史上, 除了耶稣基督, 无法找到一个能够如此增进社会与文化凝聚力的人物。

第三个特征就是把“儒家”与孔子本人等同起来。谈到孔子门徒的时候, 殷铎泽提出了新的词语: “孔子学派”(schola confuciana)。无疑地, 殷铎泽用这个词语指示“儒家”, 而在中国的学术历史上, “儒家”这个名称比“孔子学派”包含更广泛的范围。当传教士把中国思想介绍到西方时, 他们不得不把事实简单化。对他们而言, 中国思想等于儒家, 儒家也等于孔子^①。

在广州时期, 传教士也激烈地争论儒家是否无神论, 还有孔子神位是不是偶像。这就是殷铎泽提出两个重要补充的原因所在。1662年的版本只提出了偶像崇拜, 而现在殷铎泽也提到了佛教的“双重教义”: 佛教向老百姓宣传偶像崇拜(“外部教义”), 不过, 事实上, 佛教的僧侣自己什么都不信, 他们是虚无主义者或无神论者(“内部教义”)。第一位解释佛教“双重教义”的人是1577年在日本的耶稣会传教士加戈(Baltasar Gago, 约1520-1583)^②。因为传教士就中国的无神论问题发生了激烈争论, 所以殷铎泽有意加上这个段落, 以证明孔子不是一个无神论者, 中国文化思想本来也不支持无神论, 后来随着佛教的来临才出现中国的无神论者^③。

第二个补充是关于孔子神位的问题。殷铎泽很确定地说, 从古至今的“祭孔”活动都不包含任何偶像崇拜的因素。对此他提出了根据: 在牌位上面没有任何具体的形像(imago), 人们只是在神位前表示对孔子的尊敬。对殷铎泽而言, 这种仪式类似于人们对孔子后裔表示尊敬。他也提到, 连顺治皇帝也是这样做的。

最后, 殷铎泽谈及传教政策: 既然中国人那么尊敬孔子, 那么完全可以借用孔子来认可基督宗教在中国存在的合理性。相反, 如果传教士要攻击孔子, 那么, 他们的传教事业一定会失败。

总而言之, 与1662年版本相比, 1669年的版本更明显地说明孔子本人既不是某种偶像宗教

的创立者, 也不是无神论者, 而且他的教导与基督宗教也不矛盾。此外, 殷铎泽还表达了他认为“祭孔”仪式应获允许的另外两个论据: 1. 此时许多士大夫已经变成了天主教徒; 2. 如果孔子还活着的话, 他一定会皈依基督。虽然我们认为1662年版本的作者是郭纳爵, 不过, 鉴于1669年的这个新版本在篇幅上较前者多了一倍, 因此不妨说, 殷铎泽是1669年版本的作者。

三、1687年的孔子: 政治典范

前面两本书是耶稣会在中国使用的内部语言材料, 发行量十分有限。相反, 《中国哲学家孔子》则是一部内容庞杂且印本流传甚广的著作。殷铎泽在广州重新组织恩理格、鲁日满、柏应理, 要他们系统地翻译“四书”原文以及与之相关的评论。本来殷铎泽打算在1671-1672年回欧洲的时候出版这些译文, 但是他却来不及处理这项工作。而当时的法国学者 Melchisédech Thévenot (1620-1692) 偶然地从佛罗伦萨朋友 Lorenzo Magalotti 那里获得了《中国政治道德的学问》, 尽管没有得到殷铎泽的许可, 但是他在他的期刊上出版了这本书的大部分内容, 里面有拉丁文版的孔子传记, 也有法文译文^④。

等到柏应理被派遣到欧洲, 四书的编译工作才有进展。1686年, 他在法国皇家图书馆里进行了编辑工作, 1687年, 这本书最终面世, 标题为: 《中国哲学家孔子, 或者中国知识, 用拉丁文表述, 通过殷铎泽、恩理格、鲁日满和柏应理的努力》(Confucius Sinarum Philosophus, sive Scientia Sinensis latine exposita studio et opera Prosperi Intorcetta, Christiani Herdrich, Francisci Rougemont, Philippi Couplet)^⑤。

其中的《孔子传记》直接来自殷铎泽的《中国政治道德的学问》, 大部分内容是一致的。不过, 柏应理也稍微做了一些改动: 比如, 在标题里使孔子的哲学家身份更加突出: 《中国哲学之父孔子传》(Philosophorum Sinensium Principis Confucii Vita)。柏应理下了很多功夫来确定中国历史的编年, 他算出, 从孔子至1687年, 孔子的后裔共有68代(殷铎泽只是模糊地提到有六

①关于这种观念, 参见 LIONEL JENSEN. Manufacturing Confucianism[M].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7.

②加戈: 日本各派错误综述(Sumario de los errores de Japão de varias seitas, 1557年版)。

③Melchisédech Thévenot, ed., Relations de divers voyages curieux, edited by, Paris, 1672, tome IV: page title, 1; “ad lectorem,” 3-4; “Scientiae Sinicae Liber inter Confucii libros secundus,” 5-13; “Confucii Vita,” 14-18; “Avis,” 18; “La Vie de Confucius,” 19-23; “Version de quelques endroits du second livre Confucius,” 24-25). See Nicholas Dew, Orientalism in Louis XIV’s Franc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219.

十多代),已延续了2200年(殷铎泽模糊地提到有两千多年)。

关于偶像崇拜及神位的问题,柏应理也对殷铎泽的说法进行了补充。他比较详细地提到朱元璋怎么限制祭孔仪式,禁止立孔子像,只允许设神位。对柏应理来说,朱元璋这样做是为了避免人们把孔子为偶像,不过事实上,明朝创立者制定这种政策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权。无论怎样,柏应理提到朱元璋的政策是为了表明“祭孔”的行为完全不同于朝拜偶像。同样,他也描述了孔庙里所进行的仪式。

殷铎泽原来只是指出:拜孔子神位类似于向高尚的人表示尊敬,而柏应理借助一个比较对这一观点作了发挥:欧洲人在可敬人物的肖像画面前同样也习惯地作揖。1666及1669年这两个版本很明显是要说明儒家仪式不是宗教仪式(religiosus),而更是市民仪式(civilis)。柏应理进一步补充,它们也是政治仪式(politicus)。他引用了永乐皇帝关于祭孔的法令,里面清楚地表示,祭孔的目标在于以“三纲五常”来规范政治和社会。

在文字上,柏应理进行的改动极少,1687年版的孔子传记在内容上基本上与1669年殷铎泽所写的完全相同,所以我们可以确认殷铎泽是这一传记的作者。柏应理似乎也这么认为,因为在《中国哲学家孔子》的作者名单上没有提到郭纳爵而提到殷铎泽。对于孔子传记在西方的传播,柏应理的特殊贡献在于附上孔子的肖像画——这也是西方人第一次看到了孔子的样子。孔子画像有一点类似中国传统的孔像:他有胡子,戴冠,持笏^①,但背景完全不是中国的。一般来说,孔像是放在孔庙前的,然而,尽管这幅画的最上面写着“国学”(可能是指北京的国子监),但建筑物完全不像中国的孔庙。柏应理很可能是为了避免描绘一座庙宇而故意选择比较世俗的场所,即图书馆。不过,它又不像中国的藏书楼,而更像欧洲的图书馆。

其实,在16至17世纪的欧洲很流行把人像画在某种背景上,比如一个图书馆。我们可以把孔子的画像跟16世纪的《圣奥古斯丁之梦》作比较。^②如同孔子一样,圣奥古斯丁也在图书馆里面,他自己的著作排列在书架上。孔子像的背景建筑物跟这个背景很相似,只是后面的耶稣像

替换为一个缺口。这两幅画都用透视法,连天花板都是相似的。另外,《中国哲学家孔子》中的图画是完全对称的,表现出很理性化的安排次序。显然,这里所要表现的孔子,并不是一位神秘的宗教创立人,而是一个伟大的哲学家及学者。即便柏应理作了改动,我们仍然可以看出他个人的注意力不完全在于孔子本身,而在当时的士大夫怎么理解孔子,在当时的“祭孔”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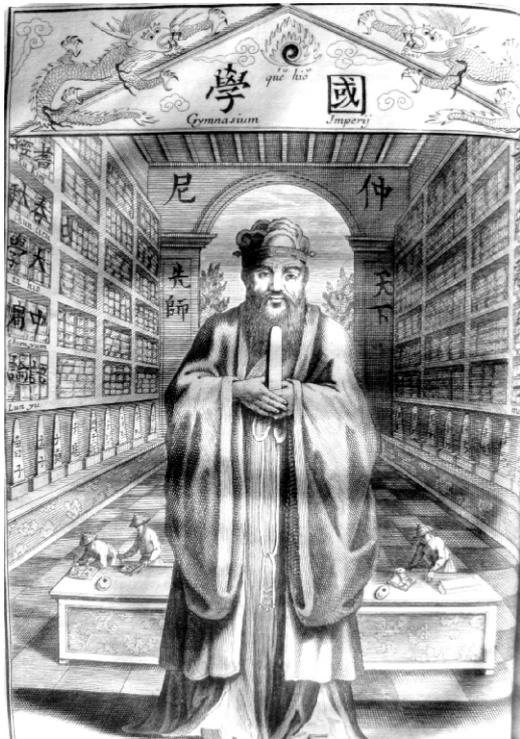
总之,我们所分析的三个《孔子传记》越来越准确地呈现出中国传统中有关孔子的信息。虽然传教士很明显地赞扬孔子,不过,他们也需要为他进行辩护,力图证明孔子自身并没有想要成立某种宗教,也没有成为偶像崇拜的对象。传教士们还想证明:尽管他是哲学家,却没有陷入无神论之中。在这三个传记里,孔子的身份就是一位“哲学家”。从13世纪到16世纪末欧洲人一直希望在东方找到基督教国家以对抗伊斯兰教,最后发现东方并没有基督教的存在。而在传教士眼中,仅次于神学的是一种“非无神论”的哲学,由于孔子出色的道德政治教诲,孔子在传教士那里便得到了“哲学之父”或“哲学家”这样的名号。

后来,法国耶稣会士杜赫德(Jean-Baptiste Du Halde, 1674-1743)搜集了耶稣会士书信,在巴黎自主编了《中华帝国及其所属鞑靼地区的地理、历史、编年纪、政治及博物》(Description géographique, historique, chronologique et physique de l'Empire de La Chine et de la Tartarie chinoise)四卷书。其中的第二卷也包括了《孔子传记》(Vie de Cong fou tseë ou Confucius)(329-324页)。杜赫德翻译了《中国哲学家孔子》中的《孔子传记》。文中所有的具体信息都是一致的,杜赫德也偶尔会加上自己的评论。不过,他删掉了原文后面涉及“祭孔”仪式的解释及辩护,因为当时梵蒂冈已禁止中国天主教徒践行儒家礼仪。杜赫德同样把孔子的画像移到自己书中,不过他稍微做了一些改动:孔子的帽子不同了,在手里没有持笏而是拿着书卷,书卷上有汉字,画中孔子所处建筑物的装饰也有了改变^④。一百多年之后,北京耶稣会院长钱德明神父(Joseph-Marie Amiot, 1718-1793)

①虽然笔者还没有找到孔子持笏的图画,不过很可能有。

②Vittore Carpaccio, Vision of St. Augustine, 1502-04, Canvas, 141 x 211 cm, Scuola di San Giorgio degli Schiavoni, Venice。孟德卫把它跟另一幅画作比较,参见David Mungello, Curious Land: Jesuit Accommodation and the Origins of Sinology (Stuttgart: Franz Steiner Verlag Wiesbaden GmbH, 1985), 272-276。

写成了更详细的《孔子传记》(Vie de Confucius)^①。钱德明也把法国耶稣会士王致诚 (Jean-Denis Attiret)的孔子画像送到巴黎单独出版^②。



《中国哲学家孔子》。梅谦立拍—获得北京语言学中心许可。

孔子(Cum Fuçu 或 Confucius),字仲尼,出生于今山东曲阜,乃中国的“哲学之父”。他的父亲叔梁纥曾任陬邑的地方行政长官,母亲姓征,出身于显贵的颜氏家族。孔子出生于第三个朝代(即周朝)第23代皇帝灵王统治的第21年,其时耶稣前551年。孔子有3000弟子,其中72个弟子出类拔萃。在这72弟子中,正如我们在皇家书院(即孔子庙)所看到的,其中10人被选择出来,他们的名字被刻在了牌位上。经过一番徒劳的努力和实践,在对其时代和统治者的改革绝望之后,孔子离开了人世,这年他73岁,当时正是周朝第25代皇帝敬王统治第49年。孔氏血统一直延续到1687年。孔子的第68代嫡系后裔如今居住在孔子的故里,并享有公爵的头衔,到这位后裔为止,孔氏血统延续了整整2238年。巴黎,诺林(Nolin)出版社,圣詹姆斯街,维克多广场。国王授权。(拉译,《孔子哲学家·前言》116页)

由于耶稣会士的翻译,18世纪的欧洲学者把孔子视为伟大的哲学家,这点在莱布尼茨及伏尔泰心中都非常根深蒂固。不过,19世纪欧洲思想对于孔子的观念及认知却产生了巨大的转折,正如黑格尔所评估的:“孔子只是一个实际的世间智者,在他那里一点也没有思辨的哲学——只有一些善良的、老练的、道德的教训,从里面我们不能获得什么特殊的东西。西塞罗留给我们的“政治义务论”便是一本有关道德教诲的书,它比孔子所有书的内容都更加丰富,而且更好。我们根据他的原著可以断言:为了保持孔子的名声,假使他的书从来不曾被翻译过,那会是件更好的事。”^③因此,从19世纪起,孔子的形象在欧洲失去了哲学的维度。而实际上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方,每个时代对孔子形象的认知都是不完全一致的。

参考文献:

- [1] 罗莹.殷多泽之《中国政治道德学说》初探[D].北京外国语大学,硕士论文,2008:13-15.
- [2] THEIRRRY MEYNARD. Chinese Buddhism and the Threat of Atheism in Seventeenth Century Europe [J]. Buddhist-Christian Studies, vol. 31,2011:3-23.
- [3] 梅谦立.最初西文翻译的儒家经典[J].中山大学学报,2008(2):131-142.
- [4] ISABELLE LANDRY. La Preuve par la Chine: la Description de J.-B. Du Halde, jésuite, 1735[M].Paris:Éditions de l'École des hautes études en sciences sociales, 2002.
- [5] Abrégé historique des principaux traits de la vie de Confucius[M].Paris: Helman, 1786年左右.
- [6]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1825-1830):第一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130.

(责任编辑 张耀南)

① “VIE de KOUNG-TSÉE, appelé vulgairement CONFUCIUS. Le plus célèbre d’entre les Philosophes Chinois,& le Restaurateur de l’ancienne doctrine”, in Mémoires concernant l’histoire, les sciences, les arts, les moeurs, les usages des Chinois par les Missionnaires de Pékin (Paris: Nyon, 1776-1791), tome 12, pp. 1-508. 钱德明列举他所用的资源: “Histoire générale, les Histoires particulières, les Préfaces mises à la tête des King, & faites par des Auteurs avoués, le Lun-yu, le Kia-yu, le Ché-ki, le Che-ki-ché-kia, le Kiué-ly-tché, le Chen-men-ly-yo-toung, le See-choujin-ou-Pé-kao, le Kou-ché, &c.”(p. 5)。

附：中国哲学之父孔子的传记

郝晓霞译梅谦立校注

孔子(Cum Fuçū 或 Confucius)更为人们熟知的名字是丘,字仲尼,中国人追随他并尊他为“哲学之父”。孔子生于鲁国(今称山东省),在陬邑村,昌平乡,靠近今天的曲阜——曲阜现归兖州市管辖^①。他生于公元前551年^②,庚子11月13日深夜两点。当时是第三个朝代(即周朝)第二十三代皇帝周灵王统治的第21年——第36轮甲子的第47年庚戌年^③;也是鲁襄公二十二年——当时襄公在统治鲁国^④。

孔子的母亲名征,出身于显贵的颜氏家族。父亲叔梁纥^⑤,不仅在宋国做大司马,而且出身高贵显赫。中国的编年史和附有年表的家谱清楚指出,孔子的祖先可上溯至商朝第二十七代皇帝帝乙。孔子出生时,叔梁纥已年近七十,在孔子三岁时,父亲离开人世^⑥。母亲在抚养孔子二十一年后过世,与丈夫合葬于鲁国东面的防山^⑦。

人们从来没有看到过六岁的孔子与同龄孩

子玩耍,他是个早熟的孩子,言行举止像个大人。在举行“俎豆”这一古老的宗教仪式以前,孔子绝不会触碰那些向老天祭祀,以示宗教敬畏的贡物^⑧。十五岁的孔子开始全身心投入到那些最有价值的典籍当中,并舍弃了一些用处不大的资料。他拣选最好的文献,使其在自己的生活中得以体现,继而将这些文献展示给那些想要仿效的人们^⑨。之后,他还跟孟懿子和南宫敬叔探讨什么样的民间仪式(ritus civiles)值得学习^⑩。十九岁时,或按照其他人的说法是二十岁的时候,孔子娶了官氏,孔子非常钟爱他的妻子^⑪。婚后第二年,官氏生儿子伯鱼。孔妻官氏先伯鱼三年离开人世,伯鱼五十岁时过世,孔子时年六十九。然而,多亏了孔子的孙子子思,孔氏血统没有因伯鱼的去世而中止^⑫。子思赞美祖父的名望和哲学,评论祖父的书籍,并身居要职。结果是孔氏血统延续至今,并享有非同一般的财富和权威^⑬。

孔子在各处担任官职并赢得了很高的赞誉。事实上,他之所以热衷于这些职位和权威,只是为了公共事务以及想传播自己的学说。而

①该传记第一部分主要节选自司马迁的《史记·孔子世家》。这里,我们会指明相应的段落。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孔子生鲁昌平乡陬邑。”此外,该传记还参照了其他资料的一些评论。

②显然,这是耶稣会士所做的纪年,这种纪年西方至今仍在沿用。

③第一个六十甲子始于黄帝统治时期,即耶稣前2697年。第36个六十甲子始于耶稣前597年。参见柏应理《孔子》,Tabula Chronologica Monarchiae Sinicae《中国王朝年表》。

④《史记·孔子世家》:“鲁襄公二十二年而孔子生。”

⑤《史记·孔子世家》:“(叔梁)纥与颜氏女野合而生孔子。祷于尼丘,得孔子。”

⑥司马迁提到当孔子出生时,他的父亲过世:“丘生而叔梁纥死。”司马迁暗示叔梁纥结婚晚,但未提及叔梁纥的确切年龄。叔梁纥七十岁生子似乎不大可能。据《孔子家语》,孔子三岁时,父亲去世。

⑦此处有个小小的错误:不是“东防山”,而是“防山”,此山在鲁国东边:“邠人袂父之母诲孔子父墓,然后往合葬于防焉……葬于防山。防山在鲁东。”

⑧司马迁提到孔子学习礼仪但未提及当时的年龄:“孔子为儿嬉戏,常陈俎豆,设礼容。”

⑨司马迁未提及。

⑩《史记·孔子世家》:“懿子与鲁人南宫敬叔往学礼焉。”我们应该特别指出殷铎泽所提及的礼仪是“民间的”(civiles),与非“宗教的”。

⑪司马迁未提及孔妻官氏的名字。

⑫《史记·孔子世家》:“孔子生鲤,字伯鱼。伯鱼年五十,先孔子死。伯鱼生伋,字子思,年六十二。尝困于宋。子思作中庸。”孔子子孙的传记资料在司马迁的记述中位于文章结尾,而不像这里的记述是在文章开头。

⑬由殷铎泽的文本看出,柏应理删除了一个段落,可能认为它没有必要:“有关这一点即他的祖先比非洲或者欧洲的贵族血统更加久远。耶稣会神父杰出的中国专家汤若望毫不迟疑地断言孔子的这位后代曾到过北京,并且自己偶然见过他,而这位后代依中国所显示的礼节极为敬重地与汤若望见面。如果我们能够恰当地追述四千年多年前统治中华民族的最古老的帝王们,我们会想到儒家的世系应该被追溯成汤禹皇帝(Chim-tam-yu-hoam-ti)。我们对古代的这些记述没有怀疑,因为中国的编年史是可靠的。”(nulli fortasse familiarum, quas vel in Africa, vel in Europa nobilitatis antiquas commendat, postponenda. Sic quidem affirmare non dubitavit P. Ioannes Adamus Schall, Soc. Iesu Sacerdos, vir Sinarum rerum peritus in primis, cum forte is, qui hac aetate Philosophi nomen, ac stirpem tuetur, eum Pekini visendi grati?, nec sine muneribus qui mos est gentis adivusset: quod si meminerimus primam Confucianae stirpis originem ab antiquissimis peti Sinicae gentis Imperatoribus Chim-tam-yu-hoam-ti; hunc autem iam ante annos 4. Mille & amplius Sinis imperavisse, nullus utique de tantâ nobilitate dubitandi locus nobis erit, si modo Sinarum chronicis fidem quam merentur dare placuerit)见殷铎泽《中国政治道德的学问》。

一旦发现自己的愿望落空,孔子便辞官,转去别处任职。这个发生过好几次,而且,在孔子五十五岁时,也有很明显的证据:他在鲁国担任Mandarinus——在此我沿用葡萄牙人的说法,他们习惯把中国管理公共事务的人们称为这样^①。在三个月内,他使得鲁国法制严明、习俗敦化、事务井井有条^②。

邻国的国君和竞争者们心生嫉妒和害怕。他们清楚地知道,保存和发展幸福的国家不是靠别的,而是得益于遵纪守法。因此,对那么卓越的政治方法,齐国的国君与权贵们设置了一个阴谋,他们向鲁国国君敬献一些礼物——漂亮的女孩子,能唱歌的姬女和其他诱人的妆奁——以隐瞒自己的阴谋^③。不明真相的鲁君接受了这些狡诈的礼物,很快沉迷于愚蠢女人的殷勤之中。大臣们也沉迷其中,这种情况持续了整整三个月。鲁君沉溺于新宠,废弃早朝。

在这种情形下,孔子无法接近君王,他对此不能容忍;于是弃官,离开王宫^④。孔子流寓至齐、卫、楚^⑤。然而事实上,这些国家也不懂欣赏别国所嫉妒的人才:孔子同样未被接受,他甚至被迫到陈,在那里被困绝粮。不久,当孔子流寓至宋,他被桓魋——一个有权力但臭名昭著的人——不止一次地追杀^⑥。但是,即使陷于如此多的麻烦之中,且常常危机四伏,孔子也没有气馁,为了传播自己的学说、为了正义,他随时准备牺牲自己。他依赖自己的良心和天上的佑助。他也认为,如果一个人完全依靠天上的照顾,那么,没有任何东西能真正地伤害他。直至生命終了,孔子都充满着热情,孜孜努力在整个帝国传播更健康的学说。他的热情难以被祖国的边界所束缚,不止一

次地想出海航行,去往更遥远的地方。

孔子有三千个弟子,五百人脱颖而出,在不同诸侯国担任官职。在美德和文化方面比其他弟子优秀的有七十二人,他们的姓名、字和出生地点被准确地记录下来。孔子为自己的学说创立了四科,并把弟子们分化等级^⑦。最高等级的科致力于培养德行,这一等级杰出者为闵子骞、冉伯牛、仲弓和颜渊。在所有弟子中,孔子最爱颜渊,并一直痛惜他的英年早逝——众所周知,颜渊三十一岁过世。第二等级,即言语科,致力于思辨和演说,其中的佼佼者宰我和子贡。第三等级,即政事科,致力于治理国家和管理公共事务,这一等级中,冉有和季路最为卓越。第四等级,也就是最后一个等级为文学科,从事工作和消遣,这一科旨在通过恰当而优美的文笔传述伦理方面的事情,两个尤其受赞美的弟子是子游和子夏。这十位门徒是七十二弟子当中最杰出者,他们如同儒家之花^⑧。

孔子的个人努力和他的整个学说,首先侧重于使已经被黑暗遮盖、被恶败坏的本性回归到原初的光明和善,如同它被“天”创造的时候那么完整。接下来,要形成一种有节制的、公正且高效的状态,最重要的是国家的和平也可能随之而来。而为了真正达到这个目标,孔子希望人们敬天、爱人、克己复礼,即服从天、敬畏天、朝拜天;如同爱自己一样去爱邻人;通过理性控制自己的欲望;非礼勿动、非礼勿言、非礼勿视、非礼勿听。孔子用文字和话语教授这些学说。更重要的是,他以身作则^⑨。关于这点,许多杰出人士能提供确凿的证据。这些人汇聚于孔子的门下,孔子所为所言,无论多么细微,由于亲眼所见,他们都会传述

①拉丁语中的“mandarinus”一词来自葡萄牙语,该词源于马来语“mantri”或者印地语“mantri”,意为“大臣”。

②司马迁就孔子的成就给出了更多的细节:“与闻国政三月,粥羊豚者弗饰贾;男女行者别于途;途不拾遗;四方之客至于邑者,不求有司,皆予之以归。”我们的文本略去了孔子在鲁国任职时的一些重要事件,比如他在五十三岁时晋升为大司寇。

③《史记·孔子世家》:“齐人闻而惧,曰:‘孔子为政必霸,霸则吾地近焉,我之为先并矣。盍致地焉?’黎鉏曰:‘请先尝沮之;沮之而不可则致地,庸迟乎!’于是选齐国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乐,文马三十匹,遗鲁君。”

④《史记·孔子世家》:“陈女乐文马于鲁城南高门外,季桓子微服往观再三,将受,乃语鲁君为周道游,往观终日,怠于政事。”

⑤《史记·孔子世家》:“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鲁今且郊,如致膾乎大夫,则吾犹可以止。’桓子卒受齐女乐,三日不听政;郊,又不致膾俎于大夫。孔子遂行,宿乎屯。”

⑥司马迁未提及,但在《孔子家语》中有此记述:“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7.23)。

⑦关于孔子学生的叙述,引自《史记》的另一章节《仲尼弟子列传》:“孔子曰:‘受业身通者七十有七人’,皆异能之士也。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政事:冉有,季路。言语:宰我,子贡。文学:子游,子夏。”我们的文本在四科的等级上与司马迁有所不同。

⑧十位弟子的这个列表引自《论语》(11.3)。值得注意的是,此处是西方最早明确运用“孔子学派”(Schola Confuciana)这一术语。后来,这一术语演变为英文的 Confucianism。

⑨我们在此处看到对《大学》开头的随意翻译。

给子孙^①。众多统治者的赞誉和几千年的尊敬——关于这点，我们马上将会提及——能证明，孔子有真正的美德，而不仅是徒有其表。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的时代并不缺乏文人学士，这些人或者已经皈依基督宗教，或者至少通晓基督宗教的完善与神圣，他们无疑地断言：如果孔子生活在我们的时代，他肯定是第一个皈依基督宗教信仰的人。

无论如何，孔子的追随者们宣称孔子是这样一个人：非常严肃（即义）、身心节制（即智）、值得信任（即信）、服从礼仪（即礼）、异乎寻常的温和（即仁）。孔子善于反省自己。他是权力和荣誉的蔑视者，他唯一不倦的努力就是，向更多的人传播自己的学说。因此，欧洲人钦羡他的谦恭，这正是我们欧洲的古代理学家所缺乏的。孔子不仅在提及自己的成就时极为谦逊，甚至公开自责：没有积极主动地学习，没能坚持自己的学说，在改正自己的错误方面不够努力，也没有努力实践美德^②。孔子坦言说他的学说实际上并不是自己的，而是来自古代，尤其是比自己早一千五百多年的立法者尧舜的学说。此时，他实际上提供了灵魂的谦逊和纯粹的最确凿的证据：尽管总有人假定孔子生而知之，甚至对此进行宣传，但孔子拒绝此说并明确否认自己能达到尽善尽美的程度^③。他总是一再地说——正如中国人所言——“西方有圣人”，不过，圣人是谁，或者与什么神灵（spiritus）有关，是不确定的^④。

实际上，公元65年，第三个朝代汉朝的第十七代帝王汉明帝被孔子的话所打动，甚至有西方的神灵托梦给他。由于考虑到安全，明帝没有自己前去，而是派遣了蔡靖和秦景两位使节以自己的名义到禺谷寻找这位圣人及其学说。当蔡靖和秦景在离红海不远的的一个岛登陆后，没敢继续往

前航行，于是他们把某个神像和称为“佛”的人像——在孔子之前，“佛”已在印度历经五百轮回——及其令人憎恶的教义带回中国。如果他们带回的不是这个祸根，而是当时圣多默宗徒在印度所宣传的基督救恩，那么他们将是幸运的，且能由此而永久地造福自己的祖国^⑤。

不过，我认为人类的幸福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在财富、权力和兴盛方面的傲慢情绪，有可能阻断通往真正幸福的道路。因此，当中国人敬拜更多的神像，并以热烈追逐新迷信的国王为榜样时，他们便逐渐背离了孔子的正宗学说和古人的谆谆教诲。最终，由于蔑视一切宗教，他们便滑入了无神论。实际上，佛陀或释迦的教义引导文人学士和更聪明的人成为无神论者，而对于普通民众来说，佛陀或释迦不过是偶像崇拜的导师罢了。当然，这个最堕落的骗子和无神论的头子保持着“双重教义”。一方面教导说万事万物无始无终，追随这一教导的那些人是无神论者，他们称这一教导为“秘密”和“内部教义”。而他们称为“外部教义”却不过是学说的表面文章，仅仅是为了适应普通民众以及无知者的迷信。

然而，毫无疑问，孔子对这个祸根有相当的免疫力。在我们这个堕落的年代，即使那些偶像崇拜者也不敢说孔子是一个偶像崇拜者。而且，孔子和中国的整个古代都与无神论保持着距离，这一点正如我们在《中庸》的评论上所提及的。孔子七十三岁过世，其时为已丑年四月——第37轮的第59年壬戌年^⑥。当时正是周朝第二十五代皇帝周敬王统治的第41年，也是鲁哀公统治孔子家乡鲁国的第16年。孔子重病前不久，悲恸于其时代的骚乱，昏迷中，他听见有天鹅在唱：“大山崩倒了（孔子想到了自己的学说）！屋梁倒塌了！智者和圣人的才思枯竭了！”^⑦随后孔子更加

①从此处开始，殷铎泽不再翻译任何中文文本，而是进行有利于孔子的论述。

②从基督宗教的观点来看，此处暗示孔子并非没有罪孽。

③《孔子》没有把孔子神化。从其出生和成就来看，他仍旧是人。

④此处可能引自《列子·仲尼篇》的章节：“孔子曰：‘三皇善任因时者，圣者则丘弗知。’商太宰大骇曰：‘然则孰者为圣？’孔子动容有闲，曰：‘西方之人有圣者焉，不治而不乱，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荡荡乎民无能名。丘疑其为圣，弗知真为圣欤？真不圣欤？’商太宰嘿然心计曰：‘孔丘欺我哉！’”这种引用是有问题的，因为这本书并不属于儒家经典，而属于道家。在《前言》第一部分第二章中，列子是作为非正统的、充满道家意味而被提及。在此，孔子扮演《旧约》中的先知，孔子，如同先知，预知耶稣基督的来临。

⑤利玛窦在《天主实义》中对此故事有更早的记述。在该书《前言》第一部分第四章，也简略提到。耶稣会士对明帝的梦的真实性没有表示任何怀疑。中国人期待圣人的到来，但定义圣人时犯了一个错。这一故事载于《后汉书》，而不是司马迁的《史记·孔子世家》。

⑥《史记·孔子世家》：“孔子年七十三，以鲁哀公十六年四月己丑卒。”

⑦《史记·孔子世家》：“太山坏乎！梁柱摧乎！哲人萎乎！”

虚弱。死前七天,他召集弟子们说:“昨夜,我梦见自己的葬礼在皇宫举行。可是,如果国王们都不重视我的学说,我们的国家还有谁会遵循我的原则呢?我唯有一死。”^①说完这些,他像睡觉似地昏迷了整整七天,最后与世长辞。

因为孔子和弟子基本在鲁国境内活动,他便葬在老家鲁国。此地靠近曲阜,位于泗水岸边。他过去教学过的书院,如今被围墙环绕,与外面隔开,如同一个城市。在书院里,身着哀服的弟子们通过斋戒、哭泣的方式哀悼他们的老师,丝毫不亚于儿子哀悼父亲。哀悼持续了一年。而有些弟子则持续哀悼了整整三年。实际上,子贡在此地持续哀悼了六年^②。孔子身材高大,而且中国人确信他是个巨人;宽厚的臂膀和宽广的心胸,使他受人尊敬并显得尊贵^③。因前额高凸,父亲给他取名为“丘”,有小山之意,因为小山的样子展示某种凸出,孔子之名由此而来^④。这位谦恭的人也用这个名字来称呼自己。正如中国人所说的,他有一张宽脸,皮肤黝黑,长了一双深邃的眼睛,头发乌黑,蓄着长胡子,鼻子扁平,而声如洪钟。

两千多年来,中国的子孙后代给予孔子如此多的敬仰,尤其是对他的著作和学说的敬仰——不是我,而是整个国家乃至精英阶层都这样认为。所有那些信仰儒家学说和儒家著作的人们,为了赢得晋升机会而参加考核,最终获得了财富、荣誉和显赫的头衔。每一个乡镇和城市,都创建了孔子书院。而且,出身文人学士的官员每当路过书院门前,都会立即从华丽的轿子中下来,步行几步,才会上轿继续前行,以示对孔子的尊敬。在大厅的正门上,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用金字写的尊称,如“致伟大的老师、文人学士的杰出而神圣的王”,或者“致一位被赋予最高智慧的人”。而且汉、隋、唐、宋、元各朝的帝王或者西方的鞑靼人,也用相似的话语来表达对孔子由衷的敬仰。

然而明朝——早于东方鞑靼人目前统治的

清朝——开国皇帝严禁在其统治期间敬拜孔子。^⑤只有经过他的同意,才可以祭奠“先师”——亦即祭奠已逝老师的生平,而他在世的那些学生却不能通过任何仪式纪念孔子。此外,皇帝也明令禁止在书院里树立孔子及弟子们的雕像,他说逝者的精神不一定非要通过神像来敬仰,通过仪式能达到同样的效果。他下令只能供奉神位,神位上写有每个人的头衔和名字。这些神位纯粹是纪念性的,但确实是孔子及弟子们的替身。这也正是祖先的神位之所以存在的理由。因此,在那些献身于儒家典籍的人那里,在他们的后代那里,对孔子及弟子们的忠实记忆不应消亡。这些神位比起我们欧洲的画像——它们向朋友和宾客优雅地描画出祖先们栩栩如生的生活图景——来说,错误更少。我们可以毫不犹豫地说孔子更值得尊敬。我们毫无冒犯之意地观察中国人在这些神位面前的跪拜行为。我们也毫无冒犯之意地观察到:当一个欧洲人有机会在父亲或国王面前行礼时,我们将看到的是脱帽致敬,正如我们最近看到暹罗王的使者所做的那样。当他们经过伟大的路易的画像前,马上止步,作揖,整个身体前倾,似乎他们被陛下所感动^⑥。

实际上,儒家的敬拜和礼节无疑是民间性的^⑦,他们不是在庙堂,或者有塑像的内殿行礼——在庙堂和内殿行礼是国法所严禁的——而是在向文人学士们开放的书院行礼。在书院,他们由司仪主持行礼,这些人中有一部分是穆斯林,他们没有任何宗教的顾虑,却憎恶迷信和异教徒的神像。在此我将不谈论“无神论政治人物”。如果我们只谈论从青少年时期就中了偶像崇拜之毒的文人学士——这些人属于一个小群体,当他们通过考试并获得书院的职位时,他们要不首先向家神请教并祈求他们的神威和力量,要不到神鬼的公共殿堂祈祷,希望有助成功。他们完全没有想到要去孔子书院,而是去了菩萨殿,而菩萨是一个很大众化的偶像。在中国向孔子拜见、祈祷或

①此处对司马迁的原文略有修改:“天下无道久矣,莫能宗予。夏人殡于东阶,周人于西阶,殷人两柱间。昨暮予梦坐奠两柱之间,予始殷人也。”

②《史记·孔子世家》:“孔子葬鲁城北泗上,弟子皆服三年。三年心丧毕,相诀而去,则哭,各复尽哀;或复留。唯子赣庐于冢上,凡六年,然后去。”

③司马迁在此给出了精确的身高,《史记·孔子世家》:“孔子长九尺有六寸,人皆谓之‘长人’而异之。”

④《史记·孔子世家》:“生而首上圩顶,故因名曰丘云。字仲尼,姓孔氏。”

⑤殷铎泽的两条线索从此处开始被删除。我们文本将讨论孔子的荣誉,这一点由柏应理补充。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声称自己对尊孔的禁令是为了坚持他自己的政治权力,而不是因为惧怕偶像崇拜,如柏应理所说。

⑥这是柏应理对殷铎泽文本的一个明确补充,柏应理曾亲眼目睹了凡尔赛的暹罗大使。

⑦利安当认为,儒家敬奉“绝不是政治性的,而是绝对迷信的”。参见《关于中国传教团的几个重要问题》,第53页。

希冀某事某物的确是闻所未闻的想法。

确实,这更证明儒家的礼节纯粹是政治性的^①。我们可以从以下的事实得知此点:在书院里,不仅供奉着孔子的大神位,七十二个弟子的小神位分侍左右,而且还供奉有其他圣贤和重要人物——他们的学说,以及他们对公职的正直而忠诚的管理,由于许多已成立的证据,通过地方官员为皇帝所知。藉着公众推荐和国王恩宠,孔门弟子至今已有相当的数量。他们被写在小神位上的名字和别的名字同列一起。事实上,当他们在指定年限携带贡物随地方官吏集中到书院时,当他们在众人面前向祖先行跪拜和叩头的礼节时,孔门弟子赢得了最高的评价。

有一位后裔与孔子在相貌上很相似,他如今居住在孔子的故乡^②。显然,我们现在谈论的这位后裔,在前面已经提到过。虽然已过去两千两百多年,超过68代,但是所有人都尊敬这位后裔,以此来纪念他的祖先。每当他来到皇宫,鞑靼的开国皇帝顺治都会依照礼节尊敬地接待他,康熙皇帝也采取同样的做法。这位后裔长久享有世袭的尊贵和头衔——“公”,并拥有不用纳税的罕见特权。当时,只有皇室血统的皇子们不需纳税给皇帝。每隔三年,所有那些被提升到进士的人都将对孔子表达感激之情,如同向密涅瓦敬献贡物一般,但因这种感激之情不能献给孔子,便献给他的后裔^③。

我们欧洲人所应该赞美和钦羨的是:虽然中国历经各种各样的命运,虽然她经历了各种战争和灾难,并见证了每个当政王朝的崛起与衰亡,但是,正如我刚刚提到的,对孔子的敬仰以及对其后裔的感恩从未中断。当然,我们这里并不包括孔子去世三百年后的那个短暂朝代,其时正当第四个王朝秦的第二代皇帝秦始皇帝统治^④,他不仅憎恨书籍,并且对待文人学士也极为野蛮。

但秦始皇帝一过世,大部分书籍又得以正常传播。儒家在鞑靼人这里也获得了敬仰。

显然,这些荣誉和溢号的意义在任何一处都显得很清楚。不过,明代的第三代皇帝永乐皇帝为我们提供了更充分的论据。他参拜书院时,向孔子致敬,并发布了如下法令:“孔子作为帝王的老师,我敬仰他。帝王是人民的主人,孔子提出了统治人民的学说,三纲,即君臣、父子、夫妻,五常,即普遍美德的五项标准(仁、义、智、信、礼)和中华帝国的伟大秩序和格局。正如我所说,孔子宣扬这些学说,以指引后世。因此,对我来说,参拜书院,并为已故老师的生平、智慧和思想写颂词以便为文人学士提供优秀的学说是再适当不过了。”^⑤

细心的读者将会明白:孔子的权威对福音的传教士而言大有裨益。在孔子的国家,人民总是热衷于他和他的书籍,无论何时都可以拿来——而事实上它也确实能够——确认基督宗教的真理。如同我们看到的,在过去,外邦人的使徒圣保禄在雅典人中采用的是希腊诗人的权威。

在此,留给我们这个传教区的那些榜样(这个传教区由他们的美德和智慧所建立),警示我们:铭记他们的榜样,在中国,我们应该有节制地赞美孔子,以便通过我们的证据和权威使他更加崇高,尤其是在一个天生骄傲且排外的民族中。而更应给我们警示的是:既然整个国家如此珍爱并敬仰孔子,那么就应当避免在言谈和文字上谴责或攻击他,以避免这个国家对我们以及对我们所宣扬的基督的反感。如果我们要强烈鄙视和谴责这样一位一贯凭理性教导人们,且因知行合一而受赞誉的人,那么我们欧洲人就会被认为——至少在中国人看来——不是在与他们的老师而是在与真理本身作斗争,我们试图熄灭的不仅是孔子之名,而且是理性的光。

①殷铎泽上面提到儒家的礼节纯粹是民间的,柏应理在此补充说这些礼节是“政治性的”。

②柏应理在加进一些关于孔子神位的讨论后,回到了殷铎泽的文本。

③密涅瓦(Minerva),古罗马神话中智慧之神,相当于希腊神话中的雅典娜女神。

④这里有明显的错误:秦始皇是秦朝第一个皇帝。

⑤永乐的这则法令未在殷铎泽的文本中找到,显然是柏应理所补充。原文如下:“孔子,帝王之师。帝王为生民之主,孔子立生民之道。三纲五常之理,治天下之大经大法,皆孔子明之,以教万世。”参见《明太宗宝训》卷四十一。